

明代官手工业 的研究

陳詩啟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明代官手工业 的研究

陳詩啓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8年•武汉

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

陳詩啓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昌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新出字第1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兼行
精華鑄字印刷廠印刷

*
787×1002毫米 $\frac{1}{32}$ 开·5 $\frac{7}{8}$ 印张·120,000字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

统一书号: 11106·50

內容提要

中国官手工业，約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整个中国封建經濟中，一直是封建統治阶级主要的生产部門，是中国封建經濟的重要的构成部分。本書包括有关明代官手工业的論文五篇，对明代官手工业的基本內容和发展綫索作了概括的叙述；在明代官手工业的組織、明代的工匠制度、明代官手工业物料的供应和管理、明代的灶戶和盐的生产，以及明代商品貨币关系的发展和官手工业的演变等方面，均有比較詳尽的介紹和分析。可供研究明代历史、尤其是經濟史的讀者参考。

目 录

明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官手工业的演变(代序)

前言	1
明代前期的官手工业	2
嘉靖、万历間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生产的发展	3
商品交流的发展和國內經濟联系的加强	12
对外貿易的发展和国内外經濟联系的加强	28
白银取得主要貨幣的地位和貨币关系的发展	31
官手工业的演变及其局限性	33
明代官手工业的組織	
官手工业的基本內容	42
工部領導下的官手工业組織	47
內府监局领导下的官手工业組織	55
戶部和都司卫所领导下的官手工业組織	60
地方官府领导下的官手工业組織	63
官手工业的监察和刑事的組織	66
結語	69
明代的工匠制度	
前言	70
輪班工匠、住坐工匠和軍匠	71
工匠和封建主的矛盾斗争	86
工匠制度的瓦解	98
明代官手工业物料的供应和管理	
物料的內容	107
物料的来源	110

物料的改折和召买的发展	122
物料的管理	132
明代的灶戶和盐的生产	
前言	139
灶戶在盐的生产中的地位	140
灶戶和盐的生产資料	146
灶戶的封建义务	150
商品货币关系的迅速发展和灶戶生产地位的变化	157
封建主剥削的加强和灶戶的赤貧化	169
灶戶分化的发展和盐业生产关系的变化	176
結語	181

明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和官手工业的演变(代序)

前 言

这个集子收集了五篇論文。这是我两年来研究明代官手工业的一些結果。其中“明代的工匠制度”一文发表于“历史研究”1955年第六期，并为三联書店收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問題討論集”；晚近在系統研究明代官手工业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材料，現已在原作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和补充。“明代的灶戶和盐的生产”一文，曾在廈門大学第二届科学討論会提出討論，并发表于“廈大学报”1957年第一期。其他三篇均系近作，尚未发表。这五篇論文虽然不能包括明代官手工业的全部內容；但是对于明代官手工业的基本內容和发展綫索却有了比較明确和概括的叙述。由于我的理論水平和业务知識很不够，在这些論文中，无论对于問題的分析或材料的处理，錯誤之处，在所难免，敬請史學界同志不吝教正。

中国的官手工业，最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它一直是封建統治阶级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門，它是中国封建經濟重要的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和整个封建

經濟的发展相适应的：一方面，我們可以从整个封建經濟的发展来寻找官手工业演变的线索；另方面，从官手工业演变本身上面也反映出封建經濟发展的水平。

中国的官手工业，从嘉靖到万历（1522至1619）将近一个世紀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和当时商品貨币关系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本文重点在于論述这一阶段商品貨币关系发展的基本情况。这是作为明代官手工业演变的条件而提出的；至于官手工业本身演变的过程和情况，后面有关各文都有較詳尽的論述，这里只把主要論点簡略一提而已。

明代前期的官手工业

我們知道，封建經濟基本上是自然經濟。“在真正的自然經濟內——在其內，农业生产物全然不加入流通过程，或仅有小部分加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地主的所得的那部分生产物，也只有比較很小一部分加入流通过程”（“資本論”第3卷頁1026）。由此可見，在自然經濟統治下，交換是微弱的，商品生产是不发达的，所以自然經濟具有“地主世襲領地之閉关自守性和自給自足性”（列寧：“俄国資本主义底发展”頁161）。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建立的官手工业，正是这种自然經濟“閉关自守性和自給自足性”的表現。

在自然經濟統治下，商品生产不发达，交換微弱，封建統治者从豪奢生活上到行政統治上所需要的工业品，不容易从市場上用交換的手段获得滿足；同时，統治者需要的手工业品部分具有特殊的性質，如皇帝穿的袍服、祭祀用的祭器、战争用的軍器、火器……等，不是一般的商品，有的在民間

是禁止造作的，这样的手工业品，事实上也无法从市场上获得。这就必须自行组织官手工业工场和作坊，强制人民，特别是手工业者提供劳动力进行必要的生产。显然，这种生产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不是为了交换，为了获取利润，或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所以官手工业具有“闭关自守性和自给自足性”。这是和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符合的。

明代的社会，是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因此，明王朝建立的官手工业仍然具有以前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但是在自然经济统治下面，社会生产力仍然不断地向前推移，所以商品经济也跟着不断地发展起来。封建社会内部的这种变化，也就影响到官手工业的变化。明代前期的社会，农业生产到达了空前繁荣的境地，某些手工业行业的生产力超越了前代的发展水平，因此，商品货币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同后期比较起来，这种发展还是有限的。一般说来，前期的社会经济，量的变化是在急剧地增长着，但是质的变化则不显著。这种情况反映到官手工业上面，是官手工业劳动力的提供仍采取从前的劳役经济制度，物料的榨取仍以实物为主，整个官手工业仍保持着稳固发展的趋势。

嘉靖、万历间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生产的发展

以英宗正统元年南畿各省漕粮改征货币为起点，大量农产品投入市场了，这就促使商品货币关系在原有的基础上面进一步发展起来了。这个发展和帝国大一统局面的巩固，国内交通的发达，以及亚洲各国对中国朝贡贸易的增进是分不开的。正统以后，这个发展一直保持着前进的姿态，直到嘉

靖年間，由於社會生產力繼續向前推移，由於對外貿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便走進了新的時期了。從嘉靖經隆慶到萬曆（1522至1567至1619）的九十七年間，是中國封建社會商品貨幣關係時代發展的階段，小生產者的分化也顯著地發展起來，因此，我同意侯外廬先生所指出的：“從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初葉，也就是從明嘉靖到萬曆年間，是中國歷史上資本主義萌芽最顯著的階段。”（“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頁91）這一個具有重大變革意義的歷史年代，對於保持了兩千多年歷史的官手工業發生了極其深刻的影响，從而促使它發生了空前的變化，所以我們有必要把嘉靖到萬曆年間商品貨幣關係發展的情況作個比較詳細的敘述。近年來因為學者們開展了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關於這方面的材料已有很多發現。這裡綜合國內學者和自己發掘的一些史料，作個比較系統的分析，並提出一些粗淺的意見，以為後列各文論述的根據。

首先從這一時期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生產發展的情況談起。從嘉靖到萬曆，商品生產較諸嘉靖以前有了極顯著的發展。現在按照行業逐一分述如下。

植棉和棉紡織技術是在十三世紀分別從南洋、越南南部和新疆吐魯番兩個方面傳入中國的。到了明代，棉紡織業普遍到全國，嘉靖以後便迅速發展起來了。江南是棉紡織業的中心地區。以湖州來說：“正嘉以前，南溪仅有紗帕，隆萬以來，機杼之家相沿比業，巧變百出。”（乾隆“湖州府志”卷41，“物產”）松江則“俗多紡織，他技不多，而精綾綾、三梭布、漆紗、剪綾綢，皆為天下第一。……百工眾技與蘇杭等。要

之，松郡所出皆切于实用，如綾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徐光启：“农政全書”引“松江志”）。松江所出棉布，其“上闊尖細者曰标布。出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下。俱走秦、晋、京边諸路”；“其較标布稍狹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諸路”（叶梦珠：“閱世篇”）。松江府因为棉紡織业发达，所以到隆庆万历以后，鞋业、暑袜业跟着发达起来。范濂“云間据目抄”云：“(初)郡中絕无鞋店与蒲鞋店。万历以来，男人多有制鞋，……遂广开諸肆于郡治东。”（“閱世編”卷2“紀风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故郡治两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同上）嘉定“邑之民业，首借棉布。紡織之勤，比戶相屬”（万历“嘉定县志”卷6“物产”）。

北方的棉布本来绝大部分仰給于江南，但到万历时情况大大改变了。如肃宁出产的布匹，在万历时質量不但已赶上松江的中品，价格且便宜十之六七。徐光启說：“肃宁一邑，所出布匹足当吾松十分之一矣。初犹莽莽；今之細密几与吾松之中品埒矣。其价格仅当十之六七，则向所云吉貝賤故也。”（“农政全書”卷35“木棉”）万历嘉定县志亦載：“今北方自織花，南方几弃織作。”由此可見，北方的棉布生产已向着江南直追。連偏远的甘肃也是“帽袜遍天下”，“褐（絨毬）之細者，皆出兰州”（“天工开物”卷上“乃服”）。

其他如麻布、葛布、苧布……等紡織手工业，东南各省都有很大的发展。如万历时，“泉州府下七县俱产棉布、苧布、葛布。葛布、青麻布、黃麻布、蕉布等，多出于山崎地方。”

（万历“泉州府志”，卷3）惠安“北鎮之布行天下”（何乔

远：“閩書”卷8“风俗志”)。广东新会的苧布，也“甲于天下”
(乾隆“广州府志”引“嘉靖府志”)。

随着棉紡織业的发展，木棉的生产也发达起来了。木棉在元时北方仅陝西部分地区有了种植，到了万历时，则河北、山东、河南、两淮都普遍种植了。如山东“登萊三面距海，宜木棉，少五谷”(張瀚：“松窗夢語”卷4)。棉花，山东“六府皆有之，东昌尤多”(万历“山东通志”卷8“物产”)。鄆城“土宜木棉，賈人轉鬻于江南……”(万历“兗州府志”卷4“风土志”)。河南也在大量种植木棉。万历时鍾化民的“救荒图說”云：“臣見中州沃壤，半植木棉。”可見河南的肥沃土地，有一半种植了木棉。江南因为是棉紡織业的中心地区，所以棉的种植更为普遍了。如松江，“官民軍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当不止百万亩”(徐光启：“农政全書”卷35)。“(崑山)三区，……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震川先生集”卷8)。这里應該指出，江南木棉的种植虽很普遍，但还不够用，需要从山东、河南运输补充，因此，山东、河南的棉花源源不絕地供应江南；而江南的棉布則大量运銷北方。这就造成了棉花和棉布交流頻繁的景况。

絲織业到了嘉靖以后也有了极显著的发展。江南是全国絲織品生产的中心地区。那里新兴的小市鎮，大都是在絲織业发达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如吳江的震澤鎮，成、弘以后，“近鎮各村尽逐綾綢之利，有力者織挽，貧者自織，而令其童稚挽花”(乾隆“震澤县志”卷25“生业”)；盛澤鎮“鎮上居民稠广，……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謹，絡緯机杼之声，通宵彻夜。……江南养蚕，所在最多，惟此鎮最盛”(“醒世恒言”

卷18)。嘉兴的濮院鎮，“人可万余家，……織絲紵”(万历“秀水县志”卷1)。“邇来(万历)……机杼声札札相聞，日出錦帛千計”(“濮川所聞記”卷4)。嘉兴“近鎮村坊，都种桑养蚕，織綢为业”(“石点头”卷4“瞿风奴情衍死盖”);“蚕桑組綉之技，衣食海內”(嘉庆“嘉兴府志”卷34“风俗”，引王世貞：“檣李往哲列傳序”)。大城市如杭州的絹，“县民織者甚众，直隶、今江西等省皆买之。”(乾隆“杭州府志”卷53“物产”，引万历“临安县志”)絲織业专业城市苏州，到了万历时代則“家杼軸而戶纂組”。其生产关系是“机戶出資，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万历实录”卷361)。蔣以化亦言：苏州“大戶張机为生，小戶趁織为活。每晨起，小戶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廟口，听大戶呼織，日取分金为饔飧計。大戶一日之机不織則束手，小戶一日不就人織則腹枵，两者相依为命久矣”(“西台漫記”卷4)。显然的，这种生产关系已是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了。

山西潞州的潞紬也名聞全国。順治“潞安府志”載，潞安“在昔(明)殷盛时，其登机鳴杼者奚啻数千家”，“其机則九千余張”；(卷1“地理”)乾隆“潞安府志”亦載：“明季长治、高平、潞卫三处，共有綢机一万三千余張。”(卷9，“田賦”)因此，潞綢“士庶皆得为衣”(呂坤：“去伪斋集”卷2)；“潞城机杼斗巧，織作純丽，衣天下”(郭子章：“郭青螺先生遺書”卷16)，所以万历“潞安府志”說“潞紬遍宇內”(卷1)。此外，四川“保宁則有絲綾文錦之饒”(張瀚：“松窗梦語”卷4)。广东“粵綢之質密而匀，其色鮮华、光輝、滑澤”；“粵紗，金陵、苏、杭皆不及”，“故广紗甲于天下，綢次之”(乾隆“广州府志”引“嘉靖府志”)。福建“出有絲紬、絹綫、絹絲、綢改机”。

“綴机故用五层。弘治間有林洪者工杼軸，謂吳中多重錦，閩織不逮，遂改綴机为四层，故名改机。”（万历“福州府志”卷8）泉州府出产的絲織品品种很多。絹“用湖州头蚕絲为上，柘蚕次之。有素織、花織、云織、金綫織、出郡城”；紗“亦用湖絲好者。有素紗、花紗、金綫紗，出郡城”；絲“用湖絲。今織者少，出郡城”；罗“有二样：一为硬罗，一为軟罗；但不如苏杭佳，亦有織天鵝絨者，不如漳州佳”（万历“泉州府志”卷3）。

桑蚕业在某些地区也有了发展。江南是全国桑蚕业最发达的地区，而湖州以“湖地宜蚕，新絲妙天下”（朱国桢：“涌幢小品”卷2）。那里“尺寸之堤必树之桑，……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頃”（“湖州府志”卷29）。嘉兴石门于万历时，“地饒桑田，蚕絲成市，四方大賈岁以五月来貿絲，積金如丘山”（康熙“石門县志”卷2“物产”引“万历县志”）。

福建、广东、江西質量較佳的絲織品，其生絲絕大部分仰給于江南。如粵綴“必吳蚕之絲所織；若本土之絲，則黯然无光”；粵紗“亦用吳絲，方得光华不褪色”（乾隆“广州府志”引“嘉靖府志”）。泉州的絹“用湖州头蚕絲为上”；紗“亦用湖絲好者”（万历“泉州府志”卷3）。“兴化民間所織紗帛，（其絲）皆資于吳中”（万历“兴化府志”卷1）。江西“芽絲非本省所产，必于浙杭等处收买”（万历“两台奏議”卷5“复議絲絹折半疏”）。

四川保宁产絲，“精細光潤，不減胡（湖）絲。……吳越人鬻之以作改机綾絹”（嘉靖“保宁府志”卷7“食貨紀”）。閩中“家种桑而人飼蚕”（章潢：“图书編”卷40），亦西南著名絲产地。

江西景德鎮的瓷器生产到嘉靖以后也已超过前代的水平

了。“饒州府志”載：嘉靖間，景德鎮“統轄浮梁县里仁、長香等都居民，已与饒州府所屬鄱陽、余干、德興、樂平、安仁、万年及南昌、都昌等县杂聚窯業，佣工为生”。那里“乃五方之民麏焉，主客无慮十万余”（“浮梁县志”“揚副使紹芳廟紀”）。万历时，“鎮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游徒，每日不下数万人”（光緒“江西通志”卷49“蕭近高參內監疏”）。“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寢”，所以王世懋称之为“四时雷電鎮”；“天下窯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二酉委譚”摘录），足見景德鎮在当时已发展为瓷业的专业城市了。景德鎮制瓷过程已很复杂。計有和土、印器造坯、圓器造坯，过利、汝水、打圈、过鋸、入匣、滿窑等項（宋應星：“天工開物”“埏埴篇”），到了万历时代，已是“制作日巧，无物不备”了。福建的瓷器也已露头角。万历“泉州府志”載，磁器“出晉江藝灶地方，又有色白，次于饒磁，出安溪崇善、龍興、龍涓三里。又有白藝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愛”（万历“泉州府志”卷3）。

采矿业和铸造业在这个时期有了大規模的生产和比較細密的分工。如徽州府“凡取矿，先認地脉，租賃他人之山，穿山入穴。……既得矿，先必烹炼，然后入爐。煽者、看者、上矿者、取鉤沙者、炼生者，而各有其任。昼夜番換，約四五十人。若取矿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故一爐之起，厥費亦重”（嘉靖“徽州府志”卷7）。万历时，华州“南山川麓立数百墟場，以炼銀砂、銅砂、錫砂，嘯聚千万人作事”；柳子鎮“有千家鉄店作刀、劍、剪、斧之用”（万历“华州志”卷9“物产述”）。湖南耒阳錫的生产規模尤大。“耒阳……产錫，四方之賈群萃其中，操其奇贏，役使大众，开坑三十多場，坑夫數

十万。”（“肇城志”第13册“湖广”）沁源的铁都由外客运销。万历“沁源县志”载：“本县虽有铁冶数处，土人不出贩卖，外客以盐布易换而去。”（卷3“物产”）

燕湖的染业很发达。“太函集”记载，万历时有个徽商名叫阮弼，在燕湖立局治染，“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毂遍于吴、越、荆、梁、燕、鲁、齐、豫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福建出青靛。“靛出山谷中，种马兰草为之。……利布四方，谓之福建青”（万历“闽大纪”卷11）。靛有两种：“叶大高者为马蓝，小者为槐蓝，七邑俱有。”（万历“泉州府志”卷3）江西赣州“种蓝作靛。西北大贾岁一至，泛舟而下，州人颇食其利”（天启“赣州府志”卷3“輿地志”）。

长江中游到明代后期，粮食的生产在全国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从前的人都说“江浙熟，天下足”，从明后期以至清朝，则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了。（顺治年間作：“地图綜要”）江西南部的赣州，米谷出产亦多。天启“赣州府志”载：“贛亡它产，地頗饒稻谷。自豫章、吴会咸仰給焉。”（卷3）“吴县志”载：“江西德安县人罗汝俟，（万历）三十六年装米三百五十石，投枫桥吴观海，售银五百两。”（卷18）安徽“六皖皆产谷，而桐之幅輿更广，所出更饶。计繇縱阳口达于江者，桐居十之九，怀居十之六，潜居十之三”（“古今图書集成”“草木典”卷28，引明方都韓：“縱川榷稻議”）。

福建的糖业到了嘉靖、万历間有了很大的进步。白糖是在嘉靖中发明制造的。“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閩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墮泥于漏斗中。視之，糖之在上者白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則黃糖，下則黑糖也。

异之。逐取泥压糖上，百试不爽。白糖自此乃见于世”（刘献廷：“广阳杂记”卷2）。到万历时，福建的糖“有黑砂糖，有白砂糖。其响糖、冰糖、牛皮糖，皆煮白砂糖为之。晋江为多，南安、同安、惠安俱有”（万历“泉州府志”卷3）。

有些地方的榨油业和造纸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如嘉兴石门镇，“镇油坊可二十家。榨油须壮有力者。夜作晓罢，即丁夫不能日操榨。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镇民少，辄募旁邑民为佣，其就募者类赤身亡赖，或故髡钳而匿名避罪者。二十家合之八百余入。一夕作佣直二銖而贏。……千百为群，即坊主人亦畏之”（康熙“嘉兴府志”卷15“艺文”下）。铅山石塘镇，万历二十八年时，纸厂槽户“不下三十多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两千人”。总计帮工达五六万人之多（康熙“上饶县志”卷10“要害志”，陈九韶：“封禁条议”）。制纸时，“每一槽四人，扶头一人，舂碓一人，检择一人，焙干一人”，所以说：“铅山惟纸利，天下之所取足。”（以上引万历“铅书”卷1“食货”）福建出纸亦多。宋应星说：“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閩省独专其盛。”（“天工开物”卷13）

云南的永昌、腾越是偏远的地区；但在这个时期也“其人儇巧，善作金、银、铜、铁、象牙、宝石、料丝、什器、布罽之属，皆精好甲他处。加以诸夷所产虎魄、水晶、古喇锦、西洋布及阿魏、鸦片诸药物，輶輶转贩，不胫而走四方”（谢肇淛：“滇略”卷4“风俗”）。

此外，如烟叶、茶叶等商品作物的生产也不断地兴起了。以上综合的材料虽然不够完整，但已足看出从嘉靖到万历年期间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已超越了嘉靖以前的水平。